

“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杨值珍

摘要：“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偶然的社会政治运动，而是有关国家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它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和压力，但是类似运动暂时难以在中国发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政治发展；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9-0071-04

2010年12月，突尼斯爆发剧烈的社会政治运动，导致突尼斯政权发生重大变化。此后，这场运动发展到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至今仍未停息。运动对当事国及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西方誉为“阿拉伯之春”。那么，作为一个在中东北非地区存在重大经济利益的国家，中国是否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那么受影响的程度如何？中国怎样应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显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一、“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原因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小贩自焚，抗议当地城管没收其售卖的水果与蔬菜，引发了该国部分地区的示威游行和社会动乱。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出走沙特阿拉伯，结束了其在突尼斯长达22年的统治。由于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这场权力更替被舆论称为“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迅速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埃及，民众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始于1月25日，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于2月11日辞职，从而结束了其对埃及长达30年的统治。在利比亚，反政府和平示威于2月15日在班加西开始，在西方支持下，反政府武装于10月23日杀死了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卡扎菲。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如约旦、也门、巴林、叙利亚，也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活动，从而出现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现象。

表面上看来，是西迪布吉德小贩自焚事件引发了“阿拉伯之春”，但究其根源，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它既是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积聚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推广西方价值观的结果，还是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

第一，经济社会因素。阿拉伯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

经济结构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据统计，2000—2009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4.7%，仅高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2008年，高技术出口仅占制造业出口的4%。^①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大量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埃及每天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利比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②在人口日趋年轻化的同时，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在利比亚，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30%；在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18—35岁的人口失业率为50%。^③在埃及，15—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25%。^④然而，有些统治者不顾很多民众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贪污腐败、恣意挥霍。例如，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家族利用权力大肆敛财，积累了高达35亿英镑的巨额财富。^⑤贫穷和贫富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温床。正是经济发展缓慢和贪污腐败现象导致的贫困和财富不均，埋下了这些国家社会动荡的根源。正如有人指出的，对经济困难的抱怨，导致突尼斯起义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⑥

第二，政治发展因素。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水平普遍不高，民主程度偏低。“在现在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8个，占全世界君主国总数的1/3，且都是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或二元君主制。”^⑦其他国家虽然实现了选举等民主的表面形式，但是大多数国家领导人不受任期限制，实际上形成了独裁统治，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家族统治趋势。事实上，这种制度设计已经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现状不相吻合了。在经济缓慢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在过去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的熏陶下，民众的政治意识已经觉醒，只不过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形势下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同时，阿拉伯国家人口增长较快，年轻人在国家人口中的比例迅速扩大。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低收入国家中，2000—2009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8%，2009年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31%。^⑧在埃及，30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5%。^⑨年轻人政治思想活跃，文化程度较高，乐于接受新观念和新思维，富于开拓意识和革新精神，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西方干预因素。亨廷顿指出，西方人确信自己文化的普世价值，坚信自己有将西方文明推广到全世界的义务。^⑩为了改造伊斯兰世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和苏联剧变的大背景下，美国推动中东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宪政改革。虽然美国担心其导致伊斯兰化而终止了这一进程，但是它为此后阿拉伯国家政治民主运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9·11”事件后，美国推出大中东倡议，再次启动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计划。对此，中东国家没有积极响应，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民主观念，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运动起到了思想动员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便利了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而且造就了一个能运用新技术、容易接受西方观念的青年群体，正是这个群体在此次社会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介入，推动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扩散。在利比亚，西方国家的军事介入，是最终推翻卡扎菲统治的重要因素。在叙利亚，西方国家或明或暗的政治干预，使得该国局势更加紧张。

第四，国际形势因素。冷战结束彻底打破了两大阵营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展开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缺乏必要的话语权，难以切实维护自身利益。阿拉伯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较弱。一些国家由于应对经济全球化举措失当，因此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这引起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拉伯国家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正如西班牙《阿贝赛报》载文指出的，2009年以来全球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某些基础商品的价格过高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⑪同时，全球化促进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阿拉伯国家大多同属威权型政权，经济发展水平类似，因此，某个国家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容易在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埃及专栏作家法赫米·豪维迪指出，政府敏锐地意识到，突尼斯发生的事情确实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气氛。它使人们确信，他们能够上街造反，这些政权并没有它们表面看来那么强大或有力。^⑫事实也是如此。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从而形成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所谓“阿拉伯之春”。

二、“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与阿拉伯国家类似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大学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贫富差距较大、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社会矛盾复杂

等。有些西方人士希望中国走西式民主道路，寄希望于中国出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2012年2月4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公开宣称，“阿拉伯之春”正在进入中国。^⑬但是，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键是看其能否赢得国民的拥护与支持；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人民的选择。事实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普遍在改革发展中获益，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政治上，中国没有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但是借鉴了古今中外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实行了选举制和干部任期制。我国的人民当家作主实实在在，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方式多种多样，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基本畅通。这使得中国党和政府极大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显然，西方臆测的“阿拉伯之春”进入中国是不现实的。当然，中国不会出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对中国没有影响。

一方面，除了给中国政治发展构成一定压力外，它给中国带来了三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它会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增幅为11.2%，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0.3%，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消费石油428.6百万吨，其中进口294.5百万吨，占中国石油消费量的68.7%，而从中东北非地区进口128.5百万吨，占中国进口石油量的43.6%。^⑭可见，中东北非在中国能源进口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中东北非地区长期陷入动荡和混乱，就会影响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石油，从而导致国内能源紧张，打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第二，它增加了中国目前处理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难度。中国既是阿拉伯各国政府的好朋友，也是阿拉伯人民的好朋友。在阿拉伯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发展本国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曾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那时，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奋斗目标一致，因此中国发展与它们的关系相对比较容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部分民众与执政当局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这使得中国处理与有关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阿拉伯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真诚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和平解决政治发展中的难题，确保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面对阿拉伯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但是，对有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国仍然感到非常棘手。特别是在外部干预问题上，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内部不成熟的议案既不利于维护有关国家的根本利益，也违背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不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内部不成熟的议案，又会引起有关国家及示威民众的误解，也会影响中国与有关国家发展关系。

第三，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内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代表。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在国际舞台上主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经济上，中国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些使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赢得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赞许和支持。然而，“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在阿拉伯国家遭受了很大的影响。2012年2月4日，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为使叙利亚人民免受冲突和战火、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政府投了反对票。这迅速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示威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是在执行“对阿拉伯暴君的沉默支持”^⑤。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示威群众还打砸了中国驻这两国的大使馆。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对中国不满，认为中国是在支持阿萨德屠杀示威群众。

另一方面，除了给中国以警示作用外，它可能对中国产生两方面的积极影响。第一，它可能形成一个对中国相对有利的阿拉伯世界格局。阿拉伯地区长期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在该地区影响不大。从目前情况看，发生反政府运动的国家大多是与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特别是埃及，自萨达特以来一直实行亲西方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在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享有较高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倾向。因此，穆巴拉克政权垮台无疑会削弱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正如福勒指出的，由于阿拉伯人民获得了选举自己领导人的权力，所以华盛顿变得越来越难以操纵这个地区了。短期内，阿拉伯民众势必不会选举亲美领导人。实际上，除民族主义领导人之外，伊斯兰主义领导人最有可能是变革的获益者。而且，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下降，不可能继续掌控局势。^⑥这种状况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实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促进阿拉伯地区战略力量平衡，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宽松的地区国际政治环境。

第二，它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影响力大大提高。为了推进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中国正在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鼓励国内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兴业。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双方虽然已经存在一些合作项目，但是合作水平比较低，发展前景还非常广阔。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与阿拉伯民族没有一点遗留的问题、纠葛和宿怨，只有共同利益，都面临着发展的共同任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和蔓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中国应该同海湾各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挑战，克服困难。”^⑦诚然，在阿拉伯国家追求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阿拉伯人民在自主选择国家领导人以后，各国必然会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这不仅会为恢复双方既有的合作项目创造条件，而且可能为双方拓展经济合

作提供新机遇。

三、“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启示

在结束海湾三国访问前夕，温家宝总理2012年1月18日在多哈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指出，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善政府的工作，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造福人民。^⑧“阿拉伯之春”启示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有13亿多人口，即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经济水平也仍然居于世界后列。同时，中国经济走的是外延扩张型发展道路，长期实行粗放型经营，投入高、产出低，社会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虽然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⑨不仅如此，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也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巨大隐患。因此，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完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控制虚拟经济规模，增强抗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第二，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公平就业，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配好蛋糕。中国改革开放是遵循先富带后富的思路展开的，在促进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地区间、行业间、个体间收入分配不平衡。事实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实际上超过了0.5。^⑩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众多的人口中，15-5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⑪这就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作为关系基本民生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和就业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必须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拓宽就业渠道，在经济平稳发展过程中促进就业、在公平就业过程中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经济朝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使广大人民不仅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能公平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强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第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导人民有序参与政治发展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总体说来，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存在不完善

的地方，选举制度还不够完善，民意渠道还不够顺畅。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面对公民参与意识强和参与水平低的矛盾，党和政府必须主动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拓宽政治参与途径，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引导到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四，加大惩处贪污腐败力度，切实转变干部队伍工作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防止具体矛盾酿成社会危机。在中央惩处贪污腐败的高压态势下，国内腐败现象有所遏制，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透明国际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中国的清廉指数为 3.6，排名第 75 位。^②这虽然比上次提升了 3 个位次，但是仍属腐败比较严重的行列。同时，有些机关工作人员素质低，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处理群众问题时态度粗暴、方式简单，导致中国版“西迪布吉德事件”不时见诸网络或报端。特别是在出现侵犯人民权益的恶性事件后，有些部门不是严格查处而是掩盖真相。这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党和群众的鱼水之情，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素质，严格干部管理，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

第五，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防止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新中国成立之初，艾奇逊们就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再显身手”。现在，麦凯恩们又鼓吹“阿拉伯之春”进入中国。事实表明，意识形态斗争始终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如亨廷顿所言，“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③中国年轻人数量多，敏于新观念，善于新思维。如果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武装其头脑，其他思想观念就会对其进行侵蚀，从而产生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后果。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必须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在加强国情、党情教育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将世情重新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民客观认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六，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做好对外政策宣传，增强对外政策的针对性和被认可度、被接受度。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相互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把握，从而制定针对性强、被认可度高

的外交政策。同时，外交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对方的解读和认知。即使一项非常善意的政策，如果被对方解读和认知为恶意，那么它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事实上，在此次叙利亚社会政治运动中，中国负责任的做法不仅没有

赢得阿拉伯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反而引起了对中国使馆的攻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缺乏理解，对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的意图发生了误读。这说明中国有关部门对中阿文化差异认知不足，与阿盟沟通不够，对外政策宣传不到位，以自我认知取代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认知。因此，中国平时要注重国际问题研究，注意外交政策宣传，把握对外关系中的主动权，增强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避免外交行为被误读而损害国家利益。

注释：

①⑧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11, pp.351-353, 345.

②④ 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回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赵灵敏：《“阿拉伯之春”只是变革的开始》，《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7期。

⑤⑦⑨ 王猛：《阿拉伯国家剧变与“威权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

⑥⑫ Mona El-Naggar and Michael Slackman, Arab Leaders Keep a Wary Eye on Tunis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1.

⑩⑲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UK Ltd, 1997, p.218, 117.

⑪ 王萌：《西报文章分析——世界食品价格上涨的十大原因》，《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1日。

⑬ Mark Mcdonald, The Arab Spring Is Coming to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2.

⑭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 June 2011, pp.2, 18.

⑮ 龙纳诚：《愤怒的阿拉伯世界》，《世界知识》2011年第22期。

⑯ Graham E. Fuller, Who Are the Biggest Losers and Winners Coming out of the Arab Spring?,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8, 2011.

⑰⑱ 王慧绵：《结束访问海湾三国前夕温家宝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月20日。

⑲ 江涌：《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世界知识》2008年第9期。

⑳ 丛亚平、李长久：《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1日。

㉑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日。

㉒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1, November 30, 2011.

作者简介：杨值珍，男，1972年生，湖北通城人，法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刘龙伏）